

特别策划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思践悟②

家庭建设：秉承中华传统 高扬时代价值

·编者按·

作为一个独立的家庭建设理论体系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三个注重”家庭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文化品质。深入学习和正确把握“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精神及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逻辑关系和理论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用。

■ 叶文振

从2015年春节团拜会首次发表“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家庭建设论述，到今年在四川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建设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指导，不仅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的发扬光大，还在新时代家庭建设中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学习和正确把握“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精神及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逻辑关系和理论地位，对于始终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显著提升新时代家庭建设的结构水平和整体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用。

“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理论价值

强化“三个注重”家庭论述对新时代家庭建设的思想指导是建立在深入认识和把握理论价值以后所形成的理论自信和自我自觉基础上，而要充分理解“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理论价值，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家庭建设理论体系的价值认知，二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认知。

在独立理论价值认知上，已经有了相对丰富的学习体会和研究产出，如“三个注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构筑了新时代中国家庭建设的最新理论体系；深化了对中华民族传统家庭思想和美德的时代价值认识，为在新时代家庭建设中进一步发扬光大设计了路径；有力地反驳了家庭消亡论调，强调家庭不可替代的发展规律，提出更加系统的家庭细胞说、家庭功能论和家教德育论；明确了注重家庭建设要注重什么以及如何注重，阐明了注重家庭与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注重家教与家风在家庭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体现了男女

平等既是基本国策也是重要家策的精神，展示了家庭建设中坚持社会性别平等的意义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提升关联或构成理论价值的思想认知，也就是把“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置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认识它的思想意义和理论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视察时的论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指导我们如何去加深对“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理论价值认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家庭幸福是人民幸福的重要构成，家国情怀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三个注重”家庭论述从家庭建设的角度具象和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揭示了大力推进新时代家庭建设对坚持和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内容体系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都和家庭建设息息相关，甚至是从家庭领域起步或者展开具体实践的。所以深化和端正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态度都十分有利于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包括家庭事业在内的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文化品质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三个注重”家庭论述有着非常突出的文化品质，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立场、中华民族传统家庭文化的时代融合和推动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形成的实践情怀。

马克思主义家庭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家庭

观到习近平“三个注重”家庭论述，我们强烈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革命感情，这种立场和感情既体现在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价值坚持，显示出在家庭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脉相承，又表现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创新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中国化的应用进程。结合中国家庭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家庭观是习近平“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最重要品质。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文化源远流长。习近平“三个注重”家庭论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形成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融入理论构建之中，使理论建立在百姓熟悉、能产生情感共鸣的家庭建设历史实践的智慧和上；另一方面又通过党领导中国家庭百年发展，特别是新时代家庭发展中的经验总结和思想创新赋予理论新的时代内涵，特别是新时代的家庭价值追求和健康发展理念，使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和推动新时代的家庭建设和发展。这种过往与现时、传统与当代的传承性和创新性融合进一步奠定了习近平“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源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宗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三个注重”家庭论述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实践品质。从《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家庭的本质和家庭建设的社会意义，还是家教的内涵和实施路径、家风的构成和涵养方式，在理论和方法论的论述之后，总是转向对家庭建设实际推进非常有针对性的实践性战略思考和措施推出。所以在过去几年间，在解决和应对家庭建设和发展在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方面，“三个注重”家庭论述在实践层面的指导性作用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行动思考

结合以上分析，继续推进“三个注重”家庭论述

精神的全面实施，实际上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深化对“三个注重”家庭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价值认识，深入了解“三个注重”家庭论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及其子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了解家庭建设和党的建设、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使“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精神能转化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共识，转化为所有家庭和国家建设的行动，推动打造一个家庭友好型的社会。

二是强化对“三个注重”家庭论述文化品质的实践认知，以形成一个推进家庭建设的理论合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家庭观，既在和国际家庭理论交流合作中，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发展道路中，又结合中国家庭实际，创新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家庭观，让家庭发展为世界提供更多先进可行的中国思想和经验；敬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修身齐家的智慧和智慧，并转化为适应新时代家庭发展需要的家庭建设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强化问题意识和实践效率，更加精准地解决家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升家庭建设的质量水平和成果转化率，以充分展示“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三是推动政府管理部门、妇联组织和高校科研机构更加紧密的优势互补合作，把过去个人化、单科化、碎片化、甚至低水平重复研究转化为多学科合作和强强联合的团队攻关，来更好地服务于“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为新时代家庭建设提供更加到位的智力支持。同时还要加强与家庭建设相关的统计制度建设和完善，扩大对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在内的家庭数字建设和运用，以确保对家庭发展态势、家庭建设推进情况、家庭政策实施效果的及时跟踪和科学估计。

(作者为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女子学院特聘教授)

图志 华夏科技女杰群芳谱 主持人：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曹诚英：中国农学界首位女教授



曹诚英(1902—1973)，字珮声，乳名行娟，安徽绩溪县上庄镇旺川村人，中国农学界首位女教授。她在马铃薯遗传育种和高产栽培中做出有益探索，为沈阳农业大学的遗传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02年，曹诚英出生于安徽绩溪一个大户人家。她自五岁起上私塾，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基础。后来，在留学美国的兄长的鼓励和帮助下，曹诚英顺利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其间，她加入了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柔石等人创办的文学团体“晨光社”，写下了大量的诗词，常在社刊《晨光》上发表文章。1925年夏，曹诚英从杭州第一女师毕业，1928年，曹诚英进入中央大学农学院继续学业，并于1931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当时，她的毕业论文被译成英文，在美国的一家农学杂志上发表，可见她在科研上的潜力。

1934年，曹诚英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深造，主修遗传育种，成为绩溪当地第一位女留学生，并顺利获得硕士学位。

1937年，曹诚英学成回国，任职安徽大学农学院，成为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1943年，曹诚英前往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农学院任教。期间，曹诚英主动提出给学生教授作物栽培学，同时开展马铃薯遗传育种研究工作。当时，她主持了农学系的十项科研项目之一“马铃薯正方丛播”试验研究，带着薛崇正、汤国娥、徐仁杰和冯雅琴四名助教，在离校门最近的东陵实验农场开展试验。

当时，马铃薯退化问题严重制约生产，成为国内外科学家关心的一个难题。曹诚

英从国外引进高产的“男爵”品种却发现该品种对晚疫病等真菌性病害抗性差，且有易腐烂、芽眼深、薯块小、易空心等缺点。她坚信问题的原因在于病毒而非李森科所说的高温。她将从东北当地筛选出的抗病的红皮马铃薯与“男爵”品种进行杂交，以期获得高产抗病的新品种，解决马铃薯退化问题。曹诚英每天都到实验农场进行品种杂交试验，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方从播薯薯块取得了成功。她选育出马铃薯高产抗病新品种并创立了一套新的栽培技术，使马铃薯每公顷产量大幅度提高，研究推动了整个东北地区马铃薯的生产。

曹诚英不仅有刻苦钻研的科研精神，还是一位敢于坚持真理的科学家。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位遗传育种专家，曹诚英在科研的同时，还给学生讲授遗传学课程，这使

得她在学科理论上绕不开李森科—米丘林与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争论。在当时的争论中，作为沈阳农学院遗传学系的筹建者，曹诚英坚持真理，在遗传学座谈会上敢于发声，并撰文《应当解除顾虑》在沈阳农学院院刊上发表，公开站出来批判李森科学说，赢得了师生的尊重。

1969年，因沈阳农学院下迁农村，体弱多病且已退休的曹诚英回到故乡绩溪。她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为家乡建造小学、修路修桥、建电磨坊，从内心深处热爱家乡，愿意为之付出。1973年，曹诚英因肺癌病逝于上海。曹诚英的一生，对祖国、对事业、对家乡都是一片赤诚。她既有着诗人的浪漫和才情，也有着科学家的严谨和理性。在科学真理面前，她柔弱的身躯能爆发出无比的勇气。

专家视点

家庭单位政府合力 推动父职转向

·阅读提示·

■ 王向贤

当代中国的父职正在初步发生着从缺席向关爱的转型。父亲从缺席转向关爱既已初步成为社会共识后，全社会需要进一步思考。让孩子目睹暴力就会增大孩子习得暴力的可能性，履行父职应阻断传统男性气质的再生产，不要向子女施暴，父亲们需要特别积极地承担日常照顾，妻子和双方老人不应将男性排挤至育幼的最外围，每个家庭、每个用人单位和相关社会政策应共同推动父职转向。

当代中国的父职正在初步发生着从缺席向关爱的转型。父亲从缺席转向关爱既已初步成为社会共识后，全社会需要进一步思考。让孩子目睹暴力就会增大孩子习得暴力的可能性，履行父职应阻断传统男性气质的再生产，不要向子女施暴，父亲们需要特别积极地承担日常照顾，妻子和双方老人不应将男性排挤至育幼的最外围，每个家庭、每个用人单位和相关社会政策应共同推动父职转向。

消除暴力应当成为基本的父职内容

关于暴力的大量社会学研究指出，暴力并非天生，在习得暴力的众多环节中，家庭不容忽视，其中的性别和代际特征尤其需家长们警惕。

第一，让孩子目睹暴力就会增大孩子习得暴力的可能性。国内外的大量研究显示，夫妻暴力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暴力形式，在婚姻存续期间，约三分之一至一半以上的夫妻曾发生过肢体暴力。发生在夫妻间的暴力不但破坏着性别平等，而且孩子目睹父母间发生的暴力本身，就会从以下三方面增大孩子习得暴力的可能：将暴力作为解决矛盾的方式，使用暴力对待他人，接受他人对自己施加的暴力。因此，夫妻之间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沟通，停止夫妻暴力，是减少和防止孩子在家目睹暴力、从而习得暴力的根本途径。

第二，阻断传统男性气质的再生产。国内外关于暴力和男性气质的研究发现，传统男性气质特别体现于三方面：男性被鼓励去掌控他人，以暴力维护男性尊严，将性掠夺作为男性气质的证明方式。不过，传统男性气质虽然社会危害巨大，严重破坏

人们最基本的安全感，但并非不可消除，家庭作为培养男性气质的首要场所，父亲作为儿子男性气质养成的第一参照者，可起到防微杜渐的基础作用。教导儿子形成非暴力、平等待人、尊重女性意愿的男性气质，是父亲们阻断传统男性气质的切实贡献。

第三，不要向子女施暴。国内多项研究显示，父母向孩子施暴非常普遍，单单肢体暴力，就约有六七成以上的父母曾向孩子施加过。作为父亲，由于多被当成规则的最后施行者和儿童道德的最终管教者，所以相较于母亲，父亲更可能被要求或被鼓励对被认为了重大错误的孩子施加体罚。虽然有些子女在成年后会认为父亲管教得有理，但研究表明这是有前提的：体罚是偶尔的、不严重，并且子女能明显感受到父亲是爱自己的。而且，更多的研究不支持体罚，一是体罚不能真正地有效管教子女，而且易于招致子女反感和敌意；二是有些父亲向孩子施暴，并非出于孩子过错，而是父亲将生活或工作中的其他不快迁怒于孩子。

促进父职转向的社会合力

促进父亲从缺席转向关爱是个系统的社会工程，既需父亲们的个体努力，也需社会各个层面的支持。

第一，父亲们需要特别积极地承担日常照顾，特别是为三岁以下幼儿提供照料。多项全国调查显示，在子女的日常生活中，父亲的参与度除普遍明显少于母亲外，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在子女的育和教方面，后者参加较多；在子女的照料方面，很少为三岁以下幼儿提供日常照料。当代父

亲侧重为子女提供学业方面的教育，既符合“子不教，父之过”的历史传统，也符合父亲很少为三岁以下幼儿提供照料的逻辑；此年龄段幼儿日常照料远多于智力开发。然而，不论是针对成人，还是幼儿，亲子关系形成的均需大量的日常互动。对于不会经历怀孕和母乳喂养的父亲而言，欲形成深厚的亲子关系和父职认同，更加需要与幼儿频繁互动。因此，父亲积极为子女提供日常照顾，不仅事关各种育儿劳动的公平分配，而且强烈影响着父亲身份的认同，直接作用于男性对于亲子情感的享有。

第二，妻子和双方老人不应将男性排挤至育幼的最外围。自1990年代起，中国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区都陆续通过地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遵守了计生法规的男性可以在妻子分娩之后，享有3—7天左右的护理假。然而，我们的调查发现，即使是这天数相当有限的护理假，不少男性也未休满，而且主要原因并非单位要求提前结束休假，而是他们觉得自己在照料新生儿方面插不上手，被排挤在育儿照料圈的最外围；妻子最核心，双方老人次之，年轻父亲靠边站。新晋父亲们的不会照料和不被允许参与照料，由此形成循环，直接加剧了母职的不堪重负，祖辈休息闲暇权利的被损害，和幼儿不能享有完整父爱。因此，妻子和双方老人需要鼓励和支持父亲们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

第三，部分企业对男性育儿假的态度较友好。我们的调查发现，就企业经济状况看，盈利状况良好的大型企业普遍较支持父亲假，而且这类企业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成立于计划经济时期

的国有企业。因具有职工生活的社会主义福利印记，所以这类企业在执行当地的男性护理假时通常较为到位。另一种是盈利良好的大型民企。在2000年以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浪潮的推动下，有些经济实力雄厚、重视企业形象的用人单位也会主动提供男性育儿假，但首先是为中高层员工提供，从而使得父亲假带有人才竞争工具之意。但总体而言，各种企业的态度是：只要国家明确规定父亲育儿假，并且可由生育保险覆盖，企业就会执行。

第四，社会政策需正式承认带薪育儿假是男性的劳动权利。国际社会对女性双重身份(既是有酬的物质劳动者，也是无酬的人口生产者)的普遍承认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通过设立带薪产假等方式予以支持。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男性提供带薪育儿假成为欧洲国家的潮流，并于21世纪起，陆续成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正式承认的男性劳动权利。在中国，我们的调查发现，不但盈利状况较好的大型国企和民企对设立父亲假的态度较友好，而且如果给予政策设立合理，其他企业也并没有明显的反对意见。因此，父亲育儿假是否能从计生奖励上升为国家认可的劳动权利，把关者与其说在于企业，不如说在于政策制定者。

在当下中国所处的新时代，切实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在此社会大背景下，经由培养下一代而直接关系人们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关爱父职，应当成为每位男性、每个家庭、每个用人单位和相关社会政策共同推动的社会变革。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